

● 会议综述

多学科视域下的专学研究

——第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范 晔

2012年12月10日,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春城昆明隆重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台湾东吴大学、成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数十家高校、科研单位及出版社的60多位代表出席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52篇,分别从教育、考试、文学、文化、文献、人物及武举等多学科视角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彰显出科举学作为一门日益活跃的专学,具备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专题及其多学科研究方法,已成为科举学日趋成熟,走向显学的重要基础。

一、教育学视域下的科举功能与影响

有关科举制度教育功能的体现,主要指围绕科举考试活动而形成的人才培养机制及其成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朱华山院长《科举教育与辛亥革命时期兴滇人才倍出之内在关系评析》一文,对科举教育的爱国主义思想、格物致知传统及其经世致用的理念进行了深入论证,指出科举考试虽然存在教学内容僵化、教学模式固化以及功利性教育目标等负面内容,但换个角度考察辛亥革命时期滇南地区大量涌现的社会精英这一史实,便不难发现有着诸多缺陷的科举教育也

存在积极的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一文,详细论证了清代乡试中额分配、各省中额内的配额及其会试中额按省配额的具体实施情况,认为清朝政府在笼络天下士子、彰显科举考试公平公正原则方面,较好地处理了政府需求与各地士的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促进了边远、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其中所体现出的政策导向,或许能够为当今高考招生制度提供有用的借鉴。华中师范大学王玮教授《万历年间的结社活动及其影响:以黄汝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指出士子结社选文对其举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了明代文社最主要的、显性的功能,酝酿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要素,积蓄着推动科举话语权的松动、转移的力量。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从清前期八股存废三次争议看科举考试的改革》一文,论证了科举制度不断自我批评、自我完善、自我改革,得以存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内在缘由,认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并没有完全因循守旧,而是在考试形式与内容上都有所改革。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黄明光教授《明代科举制度特点探讨》一文,还对明代科举制度重进士、设八股、馆选庶常以及观政进士等特点作了详细分析,指出明代科举制度,上承唐、宋、元三代,下启清代,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整个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

作者简介:范晔,男,云南省昆明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高等教育学 (厦门 361005)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千余年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受到世人的普遍推崇与重视,其考试的教育影响也日益扩大与深入。宁波大学高教研究室主任林上洪博士《母亲受教育状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科举人物殊卷履历的分析》一文,通过对清代科举人物殊卷履历的研究,详细阐释了母亲作为家庭启蒙教育主要承担者对士子科举成功所发挥了积极作用,全文还运用了统计测量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母亲所受教育状况对清代科举人物考试成绩的影响,指出科举考试是科举时代促进社会流动、重组社会分层的工具,教育是士子获得科举成功实现代际流动的最重要条件。此外,有关家族教育与科举考试成就相互关系的论证,还涉及到科举考试中儿童制义教育的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生陈庆荣《明代儿童制义教习初探——从“破题”谈起》一文,着重阐述了明代儿童制义教育活动的详细情况,深入分析了明代儿童制义教育的史料记录,阐释了明代家长对于儿童学习制义的心态以及儿童接受制义教育的基本状况。另外,陕西师范大学田建荣教授《张载科举观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一文,重点论述了张载提倡实学,重视德行的科举态度与举士观点,指出张载反对以应举为目的和片面追求科举功名的考试思想,不仅对当时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当今教育考试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云南师范大学王玉超《论明清小说对科举教育中课业文本的反应》一文,在探讨了明清小说对科举社会中课业文本的相互关系后,详细分析了“专弄八股”与“儒理育人”两类科举教育观念下,使用正统经书与科举应试的时文选本所体现出不同功用,指出科举教育使用的正统经史与科举应试选用的时文选本具有明显的区别,明清举子偏爱时文选本,故而儒家经史束之高阁,致使举子读书的态度与风气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考试学视域下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科举制度最大的功用,在于其公正而独特的人才遴选机制。作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考试,不仅直接影响着当时封建社会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西方文官考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

研究当今教育考试活动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透过科举制度完善与严密的考试规制,探寻考试规律的重要途径。

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与陈为峰博士共同撰写的《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一文,指出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有着十分相似的考试后效,之所以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共同存在着强大的负面后效,正在于这两种考试利害与风险的高度集中性,难以承载由考试活动本身带来的责任与重负,并进一步说明根治这种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强大的负面后效,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分散其利害的高度集中性,对人才实行综合性评价,希望当今的高考制度能够借鉴古代科举制度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高考改革中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新课改理念的有效实施。此外,厦门大学博士后李欣《高利害测验项目的负面影响:科举与美国的历史借鉴》一文,同样截取高利害考试的负面后效为研究内容,比较分析了当前美国高利害测验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共同存在的一些高度相似性的考试负面后效现象,预见美国高利害测验未来可能产生的危害,并在借鉴科举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化解美国高利害测验活动中内容与形式日趋僵化,教育功能异化等危害的措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孙开键教授与陈为峰博士共同撰文《名落孙山,焉知非塞翁失马?——科举失败中的成功》,详细分析并论证了科场失意与科举遗才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大部分进士往往在仕途上销声匿迹,而那些失意的落第举子,却能发挥出才能天赋,成为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名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此外,科举制度对当今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借鉴与启示研究,还集中体现在对科举考试经验与教训的辩证分析上。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熊星函《科举制的继承与超越——外国现行高考制度改革》一文,运用辩证分析法,在对当今高考制度与古代科举制度异同比较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古代科举考试对当今高考改革的一些启示,阐述了被称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与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以此为基础,认为应该深入挖掘科举制度的内在精华与时代价值。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任西煜《高考改革路在何方——

古代科举取士制度带给我们的思考》一文,同样以科举考试与当今高考制度为研究视角,结合当前我国高考改革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探寻了科举制度对当今高考改革的一些启示。贵州财经大学邢家伟《试论科举制内容、影响与衰亡对当今教育观念的启示》一文,通过研究科举考试内容对学风及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推演了科举制度对当今教育观念的启示,认为应注意考试活动致力于人格培养、与时俱进、发挥“指挥棒”功能的作用。

另外,科举考试对当今大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启示,亦可以从科举制科选才与当今大学自主选才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得到相应的借鉴。南开大学刘清华副教授、北京教育考试院樊本富副研究员共同撰写的文章《唐代制科制度对大学自主选才的启示》,通过科举制与大学自主选才对特殊人才选拔目的的对比研究,提出了选才目的规定选才标准、人才类型决定科目设置与测评方式及选拔主体的人才选拔能力制约着选才质量三个研究结论,对当今大学自主招生制度的设置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此外,科举冒籍与高考改革的相互性研究,同样加深了对科举制度时代价值的认识,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杭州师范大学刘希伟博士《清代科举冒籍治理的担保机制——关于防治“考试移民”的一种历史追溯》一文,针对科场所存在的冒籍这一顽症,对清代童生互保、禀保机制与官员担保机制的治理措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探讨了科举冒籍的防治机制,为解决与治理当今“高考移民”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对科举制度中宗室科举活动、童试以及策问的相关研究,亦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对科举考试的具体实施进行细致的考辨。中国地质大学杨春俏副教授《清代宗室科举“四书文”题目分析》一文,便详细分析与考证了清代中后期宗室科举乡、会试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命题的“四书文”具体情形,加深了对清代中后期宗室科举考试相关问题的理解。广西师范大学邹长清副教授《清代宗室乡会试覆试制度研究》一文,同样选取清代宗室科举考试为研究内容,在《清代乡试覆试考论》^①一文的研究基础之上,阐述了清代宗室科举考试的确立,并对乡、会试

覆试制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从覆试目的、内容、等次及规模等方面考证了宗室乡、会试覆试的执行情况及其效果。云南师范大学刘明坤副教授《〈广陵潮〉中的晚清童试考析》一文,以小说《广陵潮》的主人公云麟的科举经历为视角,对清代科举考试入门资格的童试进行了研究,详细阐述了晚清童试考规、内容、习俗三方面的主要特征,反衬出参加过童试及乡试的《广陵潮》作者李涵秋的真实科举经历,再现了晚清科举考试的一段真实记录。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西汉前期策问与对策再探》一文,对科举考试的核心环节策问与对策活动的历史发端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西汉前期所形成的策问及对策这一考试形式,贯穿于西汉王朝,对后来中国文官制度中的考试选官以及科举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科举学视域下的新科举观与科举文学

在科举考试的诱导之下,朝野尚文,儒学经典与诗赋文章借助科举制度成为了天下士人共享之物,这使得对科举文学的研究,成为了在文学视域下对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研究正逐渐成为了科举学研究的重要专题。

2009年3月,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曾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全面分析并论证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此次为“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则在前文相关问题的研究基础上,从考试内容与考试文体两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变化脉络。在探讨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转换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于挖掘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积极影响。在分析科举评价与古代文学史的重写这一理论问题时,则认为科举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关联互动关系,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同时指出,在为科举制度平反的大环境下,在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之下,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在客观、理性地重新评价科举制度之

后,用全新的眼光审视科举文学,有助于发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在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同时,则开拓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这便是刘海峰教授所提及的新科举观视角变化所带来的科举研究新气象、新成果。最后,刘海峰教授指出科举制度研究,从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利于科举学的繁荣发展。

四、儒学视域下的科举文化与影响

科举制度以儒家学说为其考试的主要内容,遴选人才的道德标准亦遵循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明经科目的考试更使得儒家经学的地位日益隆重,加之明经取士胜于诗赋取士的转变,最终塑造了儒学意识形态下的科举文化。

武汉大学余来明副教授《元代科举考试以经义命题的意义及其影响》一文,通过对元代科举考试中以经义命题为主的研究,指出元代改变宋、金时期辞赋命题为主的变化,对科举制度后期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认为通过科举考试命题重心的改变,不仅有助于革除前代科举制度在体制上的不足,还借此牢笼了大量人才,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和文学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元代士人对此所表现出的肯定态度,同时又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贵州财经大学冯建民博士《清代分经试士与士人习经》一文,详细考证了清代分经试士运作情况,指出在清代分经试士制度的影响下,士子并非均匀地选择了儒家《五经》,由此形成了多寡不均的局面,修习《易》、《诗》二经的人数最多,而修习《春秋》、《礼记》的人数却相对较少。同时,在阐述清代分经试士的历史渊源以及详细考证士子分经试士分布概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分经试士的利弊得失。

对于科举制度儒学文化的论述,《天津社会科学》编辑部张献忠副编审撰写的《道统与文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一文,着重论述了在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下,由于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垄断地位被打破而产生的道统嬗变及其文化分化,指出正是作为道统与文统争夺的场域——科场,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孕育了近代的因子,昭示了中国开始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陕西师范大学硕

士生赵磊《浅谈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影响》一文,从制度、教育、文化三个视角初步探讨了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影响,并对科举制度中儒学文化的整合功能作了简要阐述。厦门大学博士生范晔《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简论》一文,对先秦儒学“道”、“贤”、“公”、“君子”、“闻达”等思想内容作了简要阐述,指出科举制度的总体设计,首重于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的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的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的昌盛,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的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高欣《试析科举制度演进的文化作用》一文,对制度与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双向建构关系进行了探讨,阐释了科举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认为科举制度确保了儒家经学的延绵不绝,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经典,对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礼俗制度等都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然而,就科举制度史实来看,科举文化影响范围远不止于对制度发展演化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更大程度上在于对世人社会风尚的塑造。厦门大学钱建状《科举与两宋士人的游学风尚》一文,通过对宋代士人游学的时代特征、主要动机、地理分布三个特点的研究,细致阐述并分析了科举制度与游学风尚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此外,上海嘉定博物馆林介宇《明清嘉定县的科举民俗——以地方志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详细论述了科举与风水、科举与民间信仰以及科举与娱乐生活三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探讨了科举时代嘉定县读书人普遍崇尚科举功名,祭祀文昌帝与魁星,建孔庙与文昌阁,争夺科场的社会心理。

五、文献学视域下的科举考证与分析

科举文献是支撑科举学研究发展与改善的基础,对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许友根教授《关于〈登科记考〉补正的几个问题——评王洪军教授新著〈登科记考再补正〉》一文,对王洪军教授《登科记考再补正》一书重复载录的史料进行了详细考证,指

出在未经方志与宗谱考证的情况下,将史料中“进士”字样的人全部载录为《登科记考再补正》一书中的“及第进士”的做法,影响了该书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值得学界引起重视。江西师范大学邱进春副教授《清钞本〈类姓登科考〉小考》一文,对《类姓登科考》这一科举文献的作者、成书时间等进行了考证,为开展《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汉阳会馆提名匾录〉的史料价值》一文,通过对《汉阳会馆提名匾录》所记载的进士、武进士、举人、武举人、恩拔岁副贡及仕宦情况的考证,详细考证与分析了清前期汉阳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并对《汉阳会馆提名匾录》中会馆的组织形式、经济状况及科举名人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台湾政治大学侯美珍副教授《清乾隆时期禁毁科举用书研究》一文,通过对乾隆时期禁毁的科举用书问题所作的深入探讨,深化了对明清科举用书出版、流传、禁毁的认识。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周腊生教授《唐代状元初始任职考》一文,详细考证了唐代及第举子守选、释褐之后的初始任职与官阶状况,认为唐代状元夺魁后初始任职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姜传松与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共同撰写的文章《明代松江状元考论》,也选取科举状元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考证了明代作为东南四大雄郡之一的松江科举状元的等第之路、行为品质及其夺魁后的人生际遇,认为明代松江状元才赋秉性虽各有千秋,但在家庭背景、登进之路及行为品行上皆有不少共同之处。

此外,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馆长《科举学的疏漏与匾额研究的学术价值》一文,主要对科举匾额的形成与发展、意义及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匾额学”概念,认为当前社会信仰缺失,道德体系崩溃与匾额的缺乏有必然的内在关联,指出要复兴传统文化和重建道德伦理,匾额这一中国文化最优秀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势在必行。北京东城区图书馆馆长肖佐刚、书记王洪鹏与师毅、王文慧两位馆员共同撰写的《科举文献开发浅论——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科举集萃”专题数据库建设为例》一文,详细介绍了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科举集萃”专题数据库的选题、建设意义及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专业的信息

化文献收藏与管理,成为了有效地整合科举文献资源,发挥科举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媒介。

六、历史学视域下的科举革废评价

1905年科举制度的突然废止,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变革纷繁复杂,对中国整个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科举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撰写的《从文言到白话——科举革废对汉语文化转型的影响》一文,通过对时文危机与科举变革的考证与分析,深入浅出地解析了废科举与汉语文化转型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论证了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止,成为了文言转向白话的关键所在,指出失去科举选士制度保障的文言文,其实用价值、学术地位以及教育影响迅速下降,从而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汉字改革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李林《天子门生的再教育——晚清进士馆开设及运作考述》一文,论述了政府在关注政治稳定、新政展开、国耻延续等方面与官员群体在平衡工作、学习、家庭之间的矛盾,晚清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文章指出,将中国“学校官僚化”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官办学堂,进士馆所延续的仍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传统,虽然科举已被革废,然而历史的惯性,仍然让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子难以摆脱蔡元培先生所痛斥的“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李立峰撰写的《新学堂中的旧举人:一位末代举人的教育生涯与命运》一文,重点阐述了科举革废后,从科举到学堂这一制度变革引发的利益调整,全文聚焦于近代常州府中学堂的末代举人童叟的研究,通过对其在常州的办学实践来解读他对近代教育的认识以此为视角,深入考察了废科举后,传统士子的艰难蜕变与转型,详细阐释了新学堂中旧举人“身已新而心仍旧”的内心世界。此外,美国圣心大学历史系柯任达教授《科举停废后的私塾改良》^②一文,在对科举革废后,私塾教育的存在原因及其发展状况进行简要论述后,着重阐释了私塾教育从完全传统的“旧式教育”改良为“新式教育”的艰难历程,全文结合大量史

实案例,深入分析了科举革废后私塾教育改良的具体细节,指出改革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和改革者应对改革地方的实际影响做充分的考量,认为科举革废后,私塾教育改良者不断调整方案以适应并维护地方教育结构与功能的做法,正是保障教育改革契合人民利益与价值的关键所在。

针对科举革废的史实考察与研究,独立学者沈登苗先生与东北石油大学牛翠萍副教授共同撰写的《梁启超否定“废科举”了吗?》一文,指出梁启超所提倡的“复科举”,仅是对科举制度形式的恢复,其实质是要引进西方的文官制度。此外,日本原胜郎教授的游记《贡院之春》,亦为科举革废的历史评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由厦门理工学院熊娟与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共同撰写的《原胜郎〈贡院之春〉与科举评价》一文,详细介绍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原胜郎教授的游记《贡院之春》及其科举评价,全文借助原胜郎教授的科举评价视角,对域外科举革废评价做出了系统考察,指出对于科举制度革废及其良恶的历史评价与认识,应站在一个更为宏大而根本的立场,全面认识中国的科举制度乃至中国文明,同时走出“复兴”科举制度的论调,树立起中国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七、其它学科视域下的相关研究

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完整性来说,除去核心的文科研究以外,武科举制度的研究作为科举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格外重要。

天一阁博物馆王宏星研究员《从天一阁藏明武举资料看明代武举制的局限性》一文,以全国古籍重点收藏单位天一阁明代嘉靖二十三年《武举录》为主要史料,分析并论证了明代中期起实施武举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武举制的利弊得失及其局限性。厦门大学博士生王晓勇《清代晚期武科举变革探析与当代反思》一文,着重从考试内容、选拔形式、录取人数、考试定位等视角,阐述了明清两代武科举最终无法逃脱被停罢命运的诸多原因,系统分析了清代晚

期武科举变革历程中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内涵。此外,对有关女性参与科举考试的活动所进行的研究,有台湾东吴大学连文萍教授的《明代女性的“功名”之路——由内廷女官沈瓊莲〈送第就试春官〉诗谈起》一文,全文通过对明代内廷女官沈瓊莲《送第就试春官》一诗的细致分析,探讨了内廷女官制度与女性功名之间的关系,并透过明代科举社会女性诗歌所反映出的科举情节,分析了明代女性的内心世界,阐述了明代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另外,中国产业转移投资促进会彭靖先生撰写的文章《邓嗣禹的科举制度研究以及对当代社会的意义》,详细阐述了邓嗣禹先生考试制度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影响,并分析了进一步扩大科举制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的具体措施,提出科举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此外,云南师范大学冯用军副教授《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兼论新科举学的判别标准、逻辑架构与发展前景》一文,通过对“新”“旧”科举学的理性切割动因、新科举学立学的合理性判别、新科举学基本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以及新科举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前景三个方面的详细论述,深入辨析了科举学的学科说与领域说之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科举学”概念,认为科举学作为学科的评判标准,应参照学科制度化的合理性为依据,透过碎片化的研究领域追寻系统化的学科逻辑,指出无论是称为研究领域或是称为学科的科举学研究,在领域与学科辩证统一和谐共生的关系下,新科举学已处于科举制度化的进程之中。

注释:

① 参见邹长清:《清代乡试覆试考论》,《清史论丛》2010年号,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69-200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修春教授翻译。

(责任编辑:王伟宜)